

·书札整理研究·

江瀚手札五通考释^{*}

柳 森

内容摘要：江瀚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并于民国元年（1912）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一职。国家图书馆藏有江瀚手札五通，收信人分别为陈夔龙、曹秉章、潘复，撰写时间为清末至民国间，其中涉及许多民国知名政治人物，由此不仅可以了解江瀚的交游情况，亦可管窥其个人经历与诸多史事。

关键词：江瀚 信札 陈夔龙 曹秉章 潘复

江瀚^①（1857—1935），字叔海，别号石翁、石翁山民，室名慎所立斋，福建长汀人。清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初三日（公历十二月十八日）辰时生于四川。光绪十九年（1893）任重庆东川书院山长，二十二年赴重庆致用书院讲学，次年受聘于长沙校经堂任教习。三十年赴日本考察教育。三十一年任江苏高等学堂监督兼总教习。三十二年初，代理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四月任学部普通司行走，七月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监督兼教务提调。三十四年升学部参事官。宣统二年（1910）初，任京师大学堂京学分科经学教授兼女子师范学堂总理，二月三十日以硕学通儒被选为资政院议员，四月二十六日升河南开归陈许道。入民国后，民国元年（1912）五月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任四川盐运使。三年七月任北京政府政事堂礼制馆总编纂。四年任参政院参政。五年任总统府顾问。八年任国史馆编纂处长。十五年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会长。十六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图书馆藏未刊稿整理与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按，截至目前，学界关于江瀚的关注极少，仅有焦树安先生的《京师图书馆早期的三位馆长缪荃孙、江瀚、夏曾佑》（《国家图书馆学刊》2001年第4期）、高福生先生的《江瀚其人及与黄云鹄、黄侃父子之关系》（《中国文化》2010年第1期）两篇成果面世，同时焦先生将江瀚的生卒年误作1853—1931，此前诸多工具书亦作此误，实际上，参看江瀚之子江庸撰《江叔海先生讣告》（民国25年铅印本）即可知，江瀚的生卒年应为1857—1935。此外，高福生先生还曾对江瀚编辑的朋友诗札集《片玉碎金》进行了释读，详见高福生：《片玉碎金：近代名人手书诗札释笺》，中华书局，2009年。

年国务院聘充礼制馆总纂。十七年任京师大学代理校长、故宫博物院顾问、理事。二十一年五月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九月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卯时，江瀚因患肺炎在北平小方家胡同四号私邸逝世。江瀚通经史、能诗文，编著有《东川书院学规》、《论孟卮言》、《诗经四家异文考补》、《南行纪事诗》、《吴门销夏记》、《宗孔编》、《北游草》、《东游草》、《石翁山房札记》、《中州从政录》、《孔学发微》、《慎所立斋诗集》、《慎所立斋文集》、《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片玉碎金》、《长汀先生著书五种》、《故宫方志目普通书目》等。

此次所考民国首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江瀚先生的五通手札，是笔者在国家图书馆从事馆藏名人信札整理工作过程中所见。这五通信函的收信人分别为陈夔龙、曹秉章、潘复，撰写时间为清末至民国间，其中涉及许多民国知名政治人物，由此不仅可以了解江瀚的交游情况，而且可以管窥其个人经历和诸多史事真相。兹以其撰写时间为序，逐录文字并加以考释，敬请方家指正。

一（见封二）

贵阳中丞大人节下：

违侍钧颜，忽逾一载。每怀高谊，曷任依依。入夏以来，伏维起居万福。瀚于新正始将师范馆监督摆脱，旋经华相奏派，考察山东、河南学务，奔驰数月，昨甫还京。此行饫闻大河南北官绅父老称诵盛美，益令人思慕不置，盖识仁知归，固已非一日矣。当此时局，瀚亦何心仕宦？惟自念愧有蕴蓄，颇思效用于时。虽囊托帡幪，为日甚暂，而怜寸雅意，感铭肺附。倘得追随帷幕，稍竭愚虑，固下怀所冀幸，而寤寐不忘者也。瀚撰有《读经札记》及《四家诗异文考补正》二书，现拟缮一清本，敬祈赐序。盖荫老云亡而海内儒风益不竞矣。虔敏崇安。江瀚谨上。

按，此函的收信人“贵阳中丞大人”应指时任江苏巡抚陈夔龙^①。此函主要表达了江瀚欲继续追随陈夔龙的强烈愿望，并邀陈夔龙为其新书作序，同时，江瀚还提及其考察学务等事。江瀚曾在自撰《南行纪事诗》中有注曰：“丁未巡学，山东抚部杨莲府讌于历下亭。”^②因“丁未”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此，其考察学务之举应发生在是年，加之信中提及“入夏以来”，据此判断，该函应撰于光绪三十三年夏季。

^①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又作小石、韶石，号庸庵，别署庸叟、庸庵老人、庸庵居士，贵州贵阳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兵部主事，升内阁侍读学士，后任顺天府府尹。曾参与议和及签订《辛丑条约》，此后历任河南布政使、漕运总督、河南巡抚、江苏巡抚、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入民国后，长期隐居上海，以遗老自居，并支持张勋复辟，曾任“弼德院”顾问大臣。著有《梦蕉亭杂记》、《松寿堂诗集》、《花近楼诗存》、《庸庵尚书奏议》等。

^②江瀚：《南行纪事诗》，民国间（1912-1949）铅印本。

值得一提的是，江瀚此行的背景是其将师范馆监督“摆脱”，即如愿卸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监督。随后，经“华相”奏派，前去考察学务。经笔者考证，此“华相”应为时任学部尚书荣庆^①，亦即下文所言“荣相”。对于此次卸职并前去考察学务一事，江瀚感到十分喜悦，还曾为此赋诗一首：“辞监督职获允，将往直隶、山东、河南三省考察学务，喜而作此：才卸皋比即据鞍，中原笑指路漫漫。借来健仆如携剑，话到名山合挂冠。齐国连乡春色早，梁台箫管劫灰寒。行游五岳从今始，嵩岱真形立马看。”^②同时，江瀚认为此行收获颇丰，即体察到了当地官民“识仁知归”的民情。江瀚所言及的“识仁”与“颇思效用于时”，均出自儒家的“仁”、“经世致用”等核心思想，这也体现了江瀚对儒学的尊崇。

信中提及江瀚所撰《读经札记》及《四家诗异文考补正》二书。其中，此《读经札记》实为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刻印于重庆东川书院的《吴门销夏记》三卷，亦即民国十三年（1924）太原印行的《石翁山房札记》九卷。对于该书的修订经历，江瀚在《石翁山房札记》的目录结尾自题道：“曩有《吴门销夏记》一书，尝刻于重庆东川讲舍。近岁重加删易，稍有增益，都为六卷，题以今名，柯凤孙学士为我序之。顷复分部别类，析作九卷。……庚申秋九月，石翁山民识。”^③该书为江瀚于光绪十二年在苏州做江苏布政使易佩绅^④幕僚时所作，对此，江瀚在《吴门销夏记》自序中有详述：“瀚于光绪丙戌岁，客苏州承宣署中。长夏无俚，时袁所忆随笔记录，明夏复然，遂积成卷帙，初非有意著书也。虽辩诬求是间，能补先儒之阙，而拾近贤之遗，然考订一途，创难因易，矧此戋戋，何足矜尚哉？故久庋箧笥，不复省视。顷者偶取观之，有与今所持论仍相合者，有曩时粗见大概，近年来，信愈笃守愈坚者，亦有少觉不安者。兹并存之，厘为三卷，名《吴门销夏记》，聊以留验所学之进退云尔。”^⑤而《四家诗异文考补正》在正式印行时易名为《诗经四家异文考补》。不过，查此二书现存各版本中均无陈夔龙序，由此可见，江瀚向陈夔龙求序之请并未如愿。

①荣庆（1859—1917），字华卿，号实夫，鄂卓尔氏，隶蒙古正黄旗。光绪九年（1883）举乡试，十二年中进士，后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官侍读学士、刑部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学、学部尚书等职。

②江瀚：《慎所立斋诗集》卷六，《长汀江先生著书五种》，民国十三年（1924）山西太原铅印本。

③江瀚：《石翁山房札记·总目》，《长汀江先生著书五种》，民国十三年（1924）山西太原铅印本。

④易佩绅（1826—1906），字笏山，又字子笏，号健斋、函楼，室名易园、未亭、壶天阁，湖南龙阳人。咸丰八年（1858）应顺天乡试中举。光绪二年（1876）授贵州贵东道员，六年至八年任贵州按察使，八年至九年任山西布政使，九年至十一年任四川布政使，十一年至十三年任江苏布政使。著有《函楼诗抄》、《函楼词抄》、《函楼文抄》、《老子解》、《通鉴触绪》、《诗义择从》等。

⑤江瀚：《吴门销夏记·自序》，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铅印本。

在信函末尾，江瀚引用了“荫老”的名言“亡而海内儒风益不竞矣”，借以表达对当时国内儒学不振的担忧。江瀚在《南行纪事诗》中有诗云：“说经吴苑接清尘，交到忘年意倍真。今日南游应有作，诗成为序属何人？（经马医科巷余荫甫故居，即所谓曲园是也。往岁余有《北游草》、《东游草》之刻，皆荫老为序。）”^①由此可知，“荫老”即指清代著名经学家俞樾^②。俞樾治经之道在于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其平生著述解决了许多难读和前人误解的文句，被称为“朴学之宗”。考二人应识于江瀚在苏州做易佩绅幕僚期间，诚如江瀚诗中所言，二人确为忘年之交，这在俞樾于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为江瀚的《北游草》所作序言中即有体现。俞樾在序中首先回顾了《北游草》的创作背景：“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朝廷以为政首在得人，仿博学宏词科例，开经济特科，命中外大臣各举所知，于是海内人士得与荐举者三百馀人，而江君叔海与焉。今年四月，来见我于春在堂，告将入都恭应特科之试。余欢曰：‘是科得人矣。’君既入都徘徊，久之，意有所不慊，竟不待试，翩然南归。复见我于春在堂，余笑曰：‘征士公车，亦如剡溪访戴，兴尽而反乎？’未几，君以诗一卷见示，题曰《北游草》，皆此行所作也。”^③对于江瀚来京后主动放弃应试经济特科之举，俞樾的评价是：“然则，君子出处之际，审之又审，非徒乘兴而来、兴尽而反也。读杂诗十二首，统筹大局，衡量古今，真诏书所谓‘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乃高尚其志，拂衣而归，吾不为君惜，深为朝廷惜矣。”^④可见，其对江瀚这位倡导儒学的后生还是赞赏有加的。

二

贵阳尚书大人钧侍：

前上一笺，亮尘签座。恭阅廿八日《邸钞》，欣谂荣膺简命，总制全川，欢忭下怀，名言罔罄。窃维天彭井络，古号奥区，地据上游，民稠土广，其为重镇，由来久矣。况本年丈丁文诚公^⑤持节之邦，又执事旧游之地，行见后

①江瀚：《南行纪事诗》，民国间（1912—1949）铅印本。

②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别号曲园居士、俞楼游客、右台仙馆主人、曲园老人、曲园叟等，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咸丰二年（1852）授翰林院编修，五年（1855）提督河南学政。遭劾被免后，乔居苏州，致力于经学研究，也兼及小说、戏曲。著有《春在堂全书》、《群经评议》、《诸子评议》、《茶香室经说》、《古书疑义举例》、《曲园杂纂》、《俞楼杂志》等。

③（清）俞樾：《北游草序》，江瀚：《北游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刻本。

④（清）俞樾：《北游草序》，江瀚：《北游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刻本。

⑤丁文诚公，即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选庶吉士，十年知岳州府，同治二年（1863）擢山东按察使，六年任山东巡抚，以诛杀慈禧太后亲信宦官安得海名于其时。光绪二年（1876）任四川总督，统蜀十年，严劾污吏，创四川机器局，修都江堰堤，改革盐法，颇有政绩。后卒官，赠太子太保，谥号文诚。

先，辉映造福岷峨，德化所流，当不仅蜀民之幸已也。

曩，翰之先父以癸丑进士，官壁山县知县。自先人于壬午年世，翰饥驱四方，去蜀复入蜀者屡矣。癸巳，为黎莼斋^①先生聘，掌东川书院，居重庆者五年。嗣因陈右铭^②中丞有湘水校经堂之约，遂至长沙，适值议论纷呶之际，留湘逾月，即托故辞去，作客吴门。旋同今内务府大臣长白奎公^③入川，在督幕三载。辛丑秋，缘聂仲方^④中丞再三相招，乃复买舟东下，盖离成都又七年矣。故闻公督蜀，喜而不寐，即拟束装来吴，随旌节而西。

翰到学部，倏已一岁有余。虽客夏曾荷致书荣相，为翰揄扬，而自顾迁疏，实孤培植，辰下虽有奏补参事，仍以道员在任候选之说。然似近日京师情形，纵得一官，亦复何乐？诚不若投身明达，尚为识所依归。审已度人，思之已熟，感恩有素，用敢自陈，想大君子延揽为怀、兼收并蓄，必能俯如所请也。

翰现寓宣武门内西单牌楼报子街西头路北，如蒙赐示，径寄学部亦可。手肃申贺，附陈愚悃，字迹潦草，希恕不恭，虔请崇安，伏惟垂照。江翰谨上。

按，收信人“贵阳尚书大人”亦指陈夔龙。至于此函的撰写时间，据《清德宗实录》载：“以江苏巡抚陈夔龙为四川总督。”^⑤由此可知，陈夔龙擢升四川总督的官方消息的发布时间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丁巳（廿八日），而江翰阅读的“廿八日《邸钞》”亦于当日登载了此消息，同时，由信中“即拟束装来吴”可知，当时陈夔龙尚在江苏巡抚任上，因此可断定，江翰此函作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后几日。

江翰此函意在追随陈夔龙入川。在恭维陈夔龙一番后，江翰历数个人经历

①黎莼斋，即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号麓农山人，贵州遵义人。历使驻英、德、法、日四国参赞，同治七年（1868）、光绪六年（1880）两次出使日本，十七年官四川川东道员，居数年，请疾去。著有《拙尊园丛稿》、《莼斋四种》、《续古文辞类纂》、《丁亥入都纪程》、《西洋杂志》、《曾文正公年谱》等。

②陈右铭，即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江西义宁人。举人出身。历任浙江、湖北按察使。光绪二十年（1894）年任直隶布政使，次年出任湖南巡抚。

③长白奎公，即奎俊（1841—1916），字乐峰，满洲正白旗人，瓜尔佳氏。历任福建兴泉永道、福建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陕西巡抚、江苏巡抚。光绪二十四年（1898）擢四川总督，二十六年署成都将军，二十九年调任刑部尚书，三十一年改任吏部尚书，次年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宣统三年（1911）任皇族内阁弼德院顾问。清帝退位后，解职归里。

④聂仲方，即聂缉椝（1855—1911），字仲方、仲芳，室名心斋，湖南衡山人。曾国藩婿。咸丰末由监生捐主事。后累迁江苏苏松太兵备道、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历任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巡抚，后任上海制造局总办。辛丑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聂缉椝时任江苏巡抚。

⑤《清德宗实录》卷五百七十六，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丁巳。

并重点强调其中与四川的交集。江瀚之父江怀廷^①终生仕于四川，咸丰三年（1853）登进士后，即署温江知县，因此，江瀚实际上生长于四川。其父“为政宽平安静，不蕲时世干练名”^②，且为官清廉，这也导致江瀚“自先人于壬午年世，翰饥驱四方，去蜀复入蜀者屡矣”。光绪十一至十四年（1885—1888），江瀚入四川、江苏布政使易佩绅幕，由此开始了漂泊不定的幕僚生涯。十四至十六年入署理四川按察史黄云鹄幕，十七年入署理四川川东道张华奎幕，十八年入四川布政使龚照瑗幕，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入四川总督奎俊幕，二十七至三十年入安徽、浙江巡抚聂缉楨幕，三十年入广西巡抚柯逢时幕。期间，江瀚自十九年起，任东川书院山长五年，任内撰写了《东川书院学规》以正学风；二十三年受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主湖南湘水校经堂讲习，但陈宝箴治下的湖南是维新变法的重镇，维新与顽固两派的斗争异常激烈，即江瀚信中所言“适值议论纷呶之际”，江瀚恐深陷纷争，故而请辞并赴江苏。对于以上经历，江瀚曾总结道：“及长，饥躯四方，迭入一督、三抚、两藩之幕，见闻日广，乃益觉经世之难。”^③不过，纵观其以上颠沛经历，江瀚欲借陈夔龙擢升川督之机重回故乡四川的请求，亦属情理之中。

函中江瀚还谈及任职学部之事。据《申报》载：“高等学堂总教习江瀚于二十二日辞行赴都”^④，即江瀚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底由苏州起程赴学部任职。此次任学部普通司行走，应受时任兵部右侍郎张仁黼保荐，江瀚就此有诗云：“特科曾参荐，学省复相招。”^⑤三十三年九月，据同时任职学部的陈衍的年谱中记载：“江瀚以布衣充参事。”^⑥此与江瀚函中所言荣庆为“其奏补参事”相符。但此事的结局是，因江瀚此前任江苏高等学堂监督，即为“观察”，品级等同于“道员”，因其已有同级官衔，因此学部尚书荣庆为其奏补学部参事一职并未成功，只能继续“候选”，此即函中所言“仍以道员在任候选之说”。可见，在学部升迁不顺也是江瀚欲投陈夔龙门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陈夔龙并未赴任四川总督一职，而迁湖广总督。那么，江瀚以上两通信函到底作用如何呢？在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申报》中，刊载

①江怀廷（1819—1882），字献卿，号兰皋，咸丰三年（1853）进士，历任于四川温江、蓬州、南溪、双流、崇庆、南充等州县，后授璧山县知县加同知衔，历充四川庚午、癸酉、丙子乡试同考官。光绪八年（1882）卒于南充任所。

②黄恺元编：《（民国）长汀县志》卷二十三，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

③江瀚：《中州从政录·序》，民国元年（1912）京师京华印书局铅印本。

④《苏州官事》，《申报》（上海版），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二十四日（西历一千九百六年五月十七日）第十版。

⑤江瀚：《简稍予侍郎》，《慎所立斋诗集》卷六，《长汀江先生著书五种》，民国十三年（1924）山西太原铅印本。

⑥陈声暨编：《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卷五，民国间（1912—1949）刻本。

了“江瀚经鄂都陈夔龙保荐而补学部参事官缺”的新闻报道^①，由此可见，陈夔龙确实给予江瀚大力支持。

三

理斋我兄大人阁下：

手书敬悉，修禊拙诗，遵命录上，并附近作三首，统希郢政为荷。修订礼制处，想已规画就绪，不审何时可以开办？外间风传靳撰又将解职，兹可确否？朴公能出任艰巨，诚大局之幸也。治安赖君子，岂不然乎？此颂勋祉，不尽欲言。弟江瀚顿首。

按，收信人“理斋”指民国著名学者曹秉章^②。该函主要述及江瀚与曹秉章交流诗作，并提及其时政治时事。首先，江瀚言及“修订礼制处”开办一事。江瀚之所以如此关心“修订礼制处”的开办情况，一方面，与其自身崇奉传统儒学及礼制有关，另一方面，更与其曾于民国三年（1914）七月起担任礼制馆总编纂的经历有关。“修订礼制处”的前身即为袁世凯执政时期设置的“礼制馆”。民国三年一月十日，袁世凯解散国会并取消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置政事堂，由此正式建立了个人独裁性质的总统集权制政体。同年十二月，宣布设立“礼制馆”并公布了《政事堂礼制馆章程》。该馆隶属于政事堂，主要掌办民国礼制，设馆长一人，由国务卿兼任，副馆长二人，由左丞与右丞兼任，总编纂一人，主任编纂五人，分掌吉、凶、军、宾、嘉五礼的编订。在江瀚任总编纂期间，礼制馆于民国三年八月正式刊行了《政事堂礼制馆礼书（六种）》^③。值得一提的是，该馆的首任馆长即为时任国务卿徐世昌，而曹秉章正是徐世昌的得意门生。

民国五年五月，因袁世凯政府内外交困且“中华帝国”流产，礼制馆随之停办，其职掌归并内务部编订礼制会办理。民国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北洋政府公布《修订礼制处简章》，由此，修订礼制处作为政府机构正式确立，附设于国务院，置处长、副处长各一人。而据同年四月二十九日的《申报》载：“北京电：设礼制处，曹秉章为处长。（二十八日上午九点钟）”^④不过，若由此推知此函作于

①详见：《申报》（上海版），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二十一日（西历一千九百八年七月十九日）第二张第二版。

②曹秉章（1864-1937），字理斋，浙江嘉善人。民国总统徐世昌受业弟子，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印铸局局长、国务院秘书厅帮办、国务院参议等职。著有《干溪曹氏历世所著书目》、《前国务总理干臣钱公行状》、《嘉善曹氏享叙录》等，曾与徐世昌筹编《晚晴簃诗汇》、《清儒学案》。

③详见：政事堂礼制馆编：《政事堂礼制馆礼书（六种）》，民国三年（1914）财政部印刷局铅印本。

④《申报》（上海版），民国九年（1920）四月二十九日第二张第六版。

民国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之前，则有失偏颇。原因在于，“修订礼制处”成立之日并非其正式开办之时。据民国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天津出版的《益世报》载：“礼制处未成立原因：国务院设立礼制处，并经任命该处职员、厘订礼制。近以该处处长曹秉章染病，迄今缠绵二旬尚未痊可，故该处应办事宜均归停顿，正式成立尚无期日。惟该处地点，则已择定瀛台附近之流水音地方云。”^①由此可见，至少在五月二十七日之前，修订礼制处虽有机构成立之事，却无正式开办之实。至于该处的正式开办时间，则是在当年秋季。对此，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在隶属于张作霖军政府的礼制馆的成立大会上，身为总纂的江瀚曾在个人发言中提及这一问题，“共和建国以来，议订礼制，已有四次：第一次为民国三年政事堂所设立，亦名礼制馆，于五年停办；第二次于六年夏间，由内务部礼俗司继续编订；第三次为九年秋间，国务院内务部会同设立之修订礼制处，于十年冬因费绌裁撤；第四次为十四年，内务部呈准设立之礼制编纂会，至本馆奉令设立后，亦告结束。”^②据此可初步推断，江瀚此函应写于民国九年秋季。

“靳揆”指时任国务总理靳云鹏^③。在此函中，江瀚也对靳云鹏下野传闻予以关注。在袁世凯政府土崩瓦解后，民国五年六月七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于二十九日下令恢复了民国元年的《中国民国临时约法》。从此，以责任内阁制为主要政体，皖、直、奉系军阀相继操纵中央政权，其中，府、院之争也愈演愈烈，而主官也数经更迭。在此背景下，靳云鹏两度出任国务总理，并先后三次组阁。民国八年九月二十四日，靳云鹏代理国务总理，十一月五日其正式任职直至次年七月二日。此后，民国九年八月九日至十年十二月二十四间，靳云鹏再度出任国务总理。其间，靳云鹏曾于十年五月十四日，令阁员集体辞职，并于当日重新组阁。由函中“外间风传靳揆又将解职”可知，该传闻应出现于民国九年八月九日靳云鹏再度出任国务总理之后。结合修订礼制处于同年秋季开办之事，可断定：江瀚此函的撰写时间约为民国九年九月左右。

江瀚在函中也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即“治安赖君子”乃大局之幸。信函中“朴公”应指时任中国民国总统徐世昌^④。民国七年十月至十一年六月，徐世

①《益世报》（天津），民国九年（1920）五月二十七日第二张第七版。

②《大公报》，民国十六年（1927）十一月十八日，转载于鲁迅：《季廉来信按语》，《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3页。

③靳云鹏（1877—1951），字翼青、翼卿，山东省济宁人。早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北洋常备军军政司参谋处提调，后任云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民国元年（1912）被任命为北洋陆军第五师师长，后任陆军部次长。二年任山东都督。四年获封一等伯爵。八年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九年再任国务总理，次年下野。此后，远离政治，寓居天津。

④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鞠人、东海、弢斋、水竹邨人、石门山人，室名退耕堂、海西草堂、归云楼，天津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军机大臣、东三省总督等职。民国七至十一年（1918—1922）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昌担任中国民国总统。任职期间,他坚持以文治国、标榜“偃武修文”,曾于民国八年二月在上海组织召开旨在和平息争的南北“议和会议”,但却无疾而终。同时,因其儒学功底深厚,不仅著书立言,而且兼通诗画,加之其曾在总统府成立“晚晴簃诗社”,因此,其素有“文治总统”之称。民国九年七月,直皖战争爆发,政局再次陷入混乱。而恰如江瀚所言,徐世昌始终以秉承儒学的“君子”形象出现,其表面主张和平并惯以元老身份和居间调停者的角色而因势操纵,从而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屹立不倒。

四

馨航总理世贤兄阁下:

顷,玉虎总长过谈,传述雅怀,至为悚惕。弟之承乏故宫博物院,既无据之之势,更无利之之心,特以在事诸人皆尽义务,实有功无过,乃获此结果,足灰任事之心,故不无怅怅耳。弟之辞长文科,盖亦知难而退,非有怨于阁下也。今日且笑语玉虎曰:“敬舆笃于旧谊,胡不以图书馆长等清闲之职优待老儒,而欲以艰巨遗之乎?”阁下闻之,当亦发一轩渠也。早拟入都,忽撄贱恙,甫臻平复,室人又下楼伤足,一俟痊可,当即还京。医者虽嘱戒饮,若陪欢讌,正兴复不浅耳。草草此布,敬颂勋绥,百惟珍重不宣。九月十八日,世愚弟江瀚再拜。

按,收信人“馨航总理”指时任国务总理潘复^①。民国十六年(1927)六月二十日,之前任交通部总长的潘复,出任张作霖军政府内阁总理兼交通部总长直至次年六月三日,因此,潘复也被视为北洋政府“末代总理”。函中的“玉虎总长”是指之前曾担任过交通总长的叶恭绰^②,“敬舆”即指时任潘复内阁教育总长刘哲^③。此函的撰写日期即为民国十六年九月十八日。该函主要表达了江

^①潘复(1883—1936),字馨航,山东济宁人。清末举人,捐纳府衔分发江苏候补。后入江苏布政使陆钟琦幕僚。民国后,历任山东实业司司长、山东运河浚浚局筹备主任、全国水利局副总裁、靳云鹏内阁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督办、张作霖军政府内阁总理兼交通部总长等职。

^②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玉虎、玉甫、玉父、誉虎,号遐庵,晚年别署矩园,室名宣室,广东番禺人。清末廪贡生,京师大学堂毕业。入民国,历任交通部路政司司长、交通部次长、总长,兼理交通银行与交通大学。九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靳云鹏、梁士诒、颜惠庆内阁的交通总长,广东军政府财政部长,为新交通系的首脑人物之一。十六年后,历任关税特别委员会委员、国学馆馆长、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部长等职。

^③刘哲(1880—1954),字敬舆,吉林永吉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文科。历任吉林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吉林省议会议长、总统府顾问等职。民国十三年(1924)任中东铁路理事会理事,十六年任教育总长兼国史馆副总裁及京师大学校长,次年任关税自主委员会委员兼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校长。后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东北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等职。

瀚已无心政务的态度，其中言及之事有二：一为对继续担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会长已力不从心并流露去意，二为已辞去京师大学文科学长一职。

首先，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九日，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成立，江瀚被推举为会长。在当时军阀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下，文化机构常以政治附属品的形式衍生并发展，成立于民国十四年十月十日的故宫博物院亦不例外，其院务管理机构和负责人的频繁调动恰恰是其时政局异动的真实反映。民国十五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时局继续动荡，院方负责人也变动频繁，先以卢永祥、庄蕴宽二人为院务维持员；七月，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决定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以逊清遗老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长；九月，因直系政府解体，故宫保管委员会亦随之消失；十二月，政府又决定成立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在此背景下，江瀚出任了会长一职，但因其时政局不稳，所以此机构和江瀚的会长职位也注定难逃“短命”的宿命。

其次，据报载：“（北京）各大学长人选大致内定者为：工科胡仁源，文科江瀚，法科张耀曾。（二十三日）”^①由此可知，江瀚应于民国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前后被选定为京师大学文科学长。但仅仅一周之后，江瀚决心辞职的消息就已见诸报端：“江瀚既决心辞职，刘哲自无法强留，遂于前日下午决定以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任。”^②而到了民国十七年二月五日，胡仁源以工科事务繁重、不能兼顾为由，致函教育总长刘哲请辞文科学长一职。对此，刘哲极力挽留未果，“因此刘又于昨晚亲到江瀚宅，协商一切，如果能得江氏同意，则江瀚为文科学长公文，即可日内发表云。”^③次日，江瀚再次受聘担任文科学长的消息被发布：“教部方面因胡仁源辞文科学长兼职意甚坚决，已于昨日函聘江瀚继任，现江已定八日就职云。”^④

表面上看，江瀚请辞以上二职，均以“毫无作为”、“力不从心”等谦辞为由，实际上，以上两件事确有关联。民国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申报》以《江瀚大发牢骚》为题发表了一则消息，其中对此有载：“（北京）江瀚函刘哲，国务院接收故宫军机处档案，因图书编辑未竣，故函请暂留应用，乃院不满意、咄咄相逼，致故宫维持会有动摇之势。瀚老不晓事、已可概见，何堪承乏大席，请辞文科学长，并将聘书缴还。（三十日下午二钟）”^⑤可见，江瀚请辞会长的直接原因在于：国务院急于接收故宫军机处档案的决定，影响了故宫正常的图书

①《北京内定之各学长》，《申报》（上海版），民国十六年（1927）八月二十四日第四版。

②《京大消息一束》，《益世报》（天津），民国十六年（1927）九月二日第四张。

③《江瀚将继任文科学长职，胡仁源言辞》，《益世报》（天津），民国十七年（1928）二月五日第四张。

④《昨发表江瀚继任文科学长，决定八日就职》，《益世报》（天津），民国十七年（1928）二月六日第四张。

⑤《江瀚大发牢骚》，《申报》（上海版），民国十六年（1927）八月三十一日第四版。

编目业务。这直接导致维持会的权威与管理工作难以维系。而此事的深层原因却是权力之争，当然，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始终凌驾于文化权利之上，久居官场的江瀚对此自然知晓。由此，一方面，江瀚便以辞文科学长为手段而向教育总长刘哲施压，以期解决此事。另一方面，江瀚在此函中却向总理潘复言明此次请辞“盖亦知难而退，非有怨于阁下也”，此中颇有此地无银、欲盖弥彰之意。

五(见封二)

馨航总理阁下：

昨接还云，敬悉种切，伏承起居曼福，欣诵无涯。顷闻故宫博物院业经贵院举聘卿、书衡二公保管，聘本维持会会员，书且常务委员，弟之维持会会长久思摆脱，兹得卸肩，固所愿也。原拟日内来京，因室人下楼伤足，至今未愈，坐此退回。兹先寄上鄙撰七册，敬求大教。盖曩在并门，百川督办为之印行，惜未校勘，颇多讹误，内有《孔学发微》三卷，于洙泗弘旨，似有所阐明，方今政府尊崇圣道，倘有取于此乎？手此代臆代面，祇颂勋祉不宣。九月廿二日，江瀚再拜。

按：收信人仍为潘复，信函撰写日期为民国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该函主要言及江瀚正式卸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会长一事。信函中的“聘卿”、“聘”是指王士珍^①，而“书衡”、“书”则指王式通^②。民国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成立，潘复内阁以此机构取代了此前的故宫博物院维持会，由此，江瀚正式从维持会会长任上卸职，而管理委员会的会长则由王士珍担任，副委员长为王式通和袁金铠，而江瀚之子江庸被任命为古物馆馆长，傅增湘则任图书馆馆长。不过，十一月六日，因德高望重且熟悉故宫博物院院务，江瀚仍被聘管理委员会顾问。^③

同时，文人交往常以文会友、以书为媒。江瀚此次寄给潘复的“鄙撰七册”

①王士珍（1861-1930），原名世珍，字聘卿，号冠儒、冠乔，河北正定人。光绪十四年（1888）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历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参谋处总办、陆军部右侍郎、江北提督等职，与冯国璋、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民国三年（1914）后任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六年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次年春去职。民国十五年任京师临时治安会长、京师救济联合会长等职。

②王式通（1863-1931），原名仪通，字志盦，号书衡、研庐，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历任编书局纂修、内阁中书、刑部山东司主事、安徽司员外郎、大理院推事、大理院少卿等职。民国元年（1912），任司法部次长，旋转任约法会议秘书。三年任袁世凯总统府内使。四年任政事堂机要局长。五年任国务院秘书长。六年任全国水利局副局长。十四年后任清史馆编修等职。

③详见：《故宫新聘六顾问：江瀚、庄蕴宽等》，《益世报》（天津），民国十六年（1927）十一月六日第四张。

即民国十三年春印于山西太原的《长汀江先生著书五种》^①,该丛书共七册,包括:《慎所立斋文集》四卷、《慎所立斋诗集》十卷、《孔学发微》三卷、《诗经四家异文考补》一卷、《石翁山房札记》九卷。信中“并门”即指太原,“百川督办”是指时任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

民国十一年,受阎锡山之邀,江瀚赴山西大学担任经学《毛诗》教授。对此经历,江瀚曾在《晋祠》一诗中提及:“清绝凉堂水,今秋两度听。四时苹自绿,九月柳犹青。稚子争扶杖(贫儿工读园学生也),衰翁愧授经(时山西大学延余讲《毛诗》)。移居来岁好,应不负山灵。”^②江瀚做此决定,与当时阎锡山大力兴办山西教育并取得斐然成绩有关。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在发展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方面均走在了全国前列,此举博得了海内外的关注与赞扬,由此也引得许多有识之士前往山西参观考察。山西在大力发展现代教育的同时,对传统儒学教育也未偏废,山西大学即开设了《毛诗》课程,因此,江瀚便欣然前往,并为山西大学编著了《诗学讲义》课本。值得一提的是,同年九月,江瀚还对阎锡山以“德化”为思想基础而开展的“整理村范”运动给予了赞扬:“五台阎公治晋之六年,巡行县邑,益悉民情,概然有反而求诸治本之意,欲以感化济法律之穷。于是,召集属官讨论政源并开村范大会实行民治,甚盛举也。虽然德化之不行久矣,世多以为迂远……谁谓德化之不可行于今乎?顾其人如何耳。”^③而阎锡山也以刊行《长汀江先生著书五种》作为优待江瀚的一项举措。此外,江瀚在山西讲学期间也备受尊崇,“其弟子多宦晋省者,欧阳英适知太原县事,为聚资筑‘难老山庄’于晋祠以志纪念,则其得人心之深,于兹可见。”^④

信中重点提及的《孔学发微》即江瀚撰于清宣统元年(1909)的《宗孔编》二卷。江瀚欲以此书为其时的张作霖军政府发挥“资治”之用,但由于军阀政府的封建专制本质和新文化运动冲击下传统儒学已呈式微之势,通儒江瀚此愿也必难达成。

【作者简介】柳森,男,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①详见:江瀚《长汀江先生著书五种》,民国十三年(1924)山西太原铅印本。

②江瀚:《晋祠》,《慎所立斋诗集》卷十,《长汀江先生著书五种》,民国十三年(1924)山西太原铅印本。

③江瀚:《太原村范序》,太原县村政事务所编《太原村范》,民国十一年(1922)铅印本。

④黄恺元编:《(民国)长汀县志》卷二十四,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

自念拙有蕴蓄頗思効用於時雖曩記

幃帳為日甚暫而

憐才雅意蹙銘肺附僅得追隨

帷幕稍竭遇慮固下僕所冀幸而寤寐不忘者

也滿撰有讀經札記及四家詩異文攷補正二

書現擬集一清奉敬祈

賜序蓋蔭老云亡而海內儒風益不競矣虔破

崇安江湖謹上

貴陽中丞大人節下違侍

鈞顏忽踰一載每懷

高誼曷往依入夏以來伏維

起居萬福滿於新正始將師範館監督擺脫旋

經華相奏派攷察山東河南學務奔馳數月昨

甫還京此行兼問大河南北官紳父老傳誦

盛美益令人思慕不置蓋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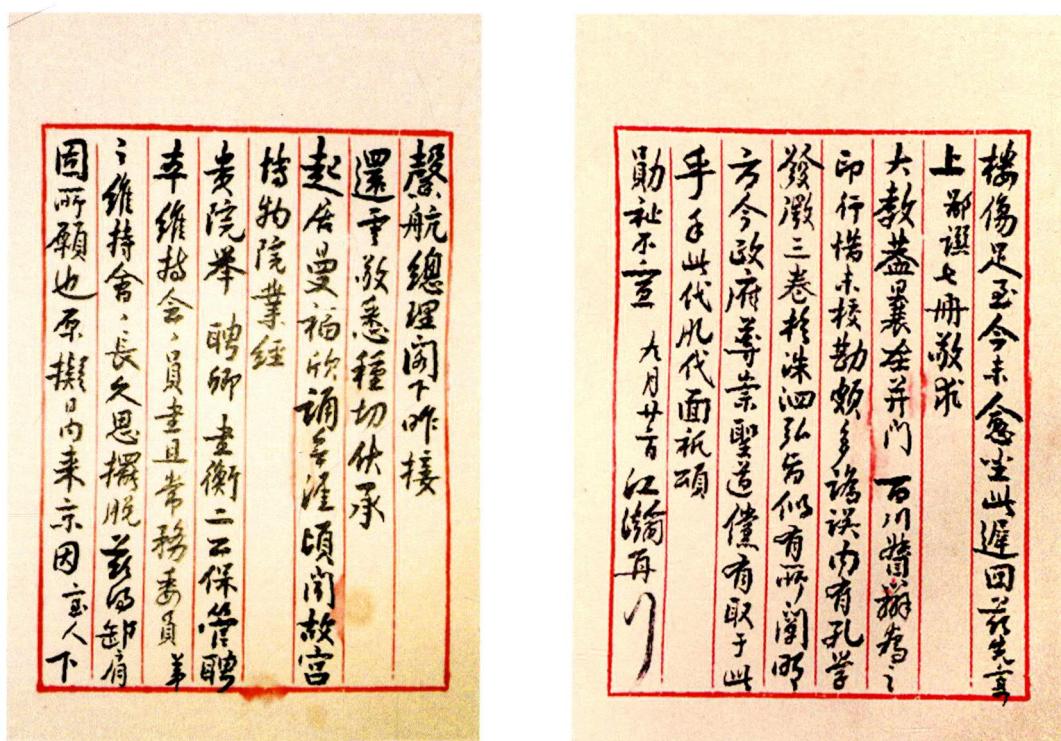
仁知歸固已非一日矣當此時局滿亦何心仕宦惟

聲航總理閣下昨接
還重啟悉種切伏承
起居萬福欣誦幸鑒頤閑故宮
博物院業經
考院舉聘仰盡衡二工保管聘
車維持全員且常務為員差
維持會長久思擺脫茲函部員
固所願也原擬日向來未定因寓人下

移傷足至令未愈坐此遲回若失尊
上鄙謹手冊敬求

大教益襄在并門石川營旅為之
印行楷赤校勘頗多謬誤內有孔嘗
發激三卷於殊泗弘旨似有所闇而
方今政府等宗聖道僅有取于此
乎在此代凡代面祇願
助祉不至 大月廿日江瀨再拜

江瀚致陈夔龙函(文见第 72 页)



江瀚致潘复函(文见第 81 页)